

【大师印象】

林非先生印象

□刘增人



我是1978年在“文革”后全国第一次鲁迅研究学术研讨会上有幸得识林非、范伯群等学者的。听说那次我被安排成为为数不多的大会发言者,也有赖于林非先生对发言稿的赏识——不知道是否准确,我不想更无法求证。1979年,党中央决定为蒙冤多年的冯雪峰同志平反,我闻讯高兴之余,匆匆草成《鲁迅日记中的冯雪峰》寄给林非先生,他当即推荐给创刊伊始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就发表在该刊1980年第2期。从此,与林非先生书来信往的事情就多了一些。林非先生的新书出版,有时也赐寄我一本。舍间收藏的林非先生赠书,共有四本:《鲁迅前期思想发展史略》(上海文艺出版社1978年11月版)、《鲁迅小说论稿》(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10月版)、《论故事新编的思想艺术及历史意义》(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4月版)、《读书心态录》(中国言实出版社2002年9月版)。

但真正与林非先生近距离接触,却只有两次。大约在1980年暑假,为了

编纂叶圣陶、王统照、臧克家三位作家的研究资料,冯光廉先生再次带我去北京,一是去图书馆续查报刊资料,二是访问知情人和向有关专家求教。那时还没有事先电话预约的习惯,因为没有那种条件。当我们来到干面胡同林非家中时,这里已经是高朋满座,幸好大都是冯先生的熟人。林非先生的夫人赵凤翔(笔名肖岚,研究现代女性作家的专家)亲自下厨,桌子上堆满了饭菜。林非先生非常热情地招呼大家吃饭,边吃边聊,兴致极高。我一句话也插不上,但免费听了一大节课,收获真的不少。

2000年夏,由中宣部和新闻出版总局主持、“鲁迅全集编辑委员会”与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承办的“鲁迅全集修订座谈会”在北京西山中宣部干部培训中心召开,到会五十余人,会议结束时选定了十四人具体担任2005年版《鲁迅全集》各卷的修订人,我被安排修订第四卷。

接到任务后,我立马推辞了一切可以推辞的工作,几乎是全身心地投入到了修订事

业。也许是这一卷问题相对较少,修订难度较小,2002年底就交卷了。2003年4月,接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前往北京定稿的通知,才知道我修订的第四卷和天津师大王国授先生修订的第三卷是一组,一起定稿,而定稿组负责人就是林非先生。

在我的印象中,人民文学出版社真的是节俭办社的模范。在像我这种觉悟不高的俗人看来,甚至有点“抠门”。他们的办公条件极差,诸位在国内都大名鼎鼎的编辑先生使用的都是看不出原来颜色的桌椅。通往办公室的走廊两侧,好像都堆满了各种各样的书报杂志,或齐胸,或等腰,走来走去时,颇似当下不少城区街道被各种汽车塞满的感觉。请作者来社修订稿件寄宿的客房,也简陋得实在可以,那被褥,好像从来就没有拆洗过,只要你不动,被窝筒可以一直坚持着筒状,数日都不塌架、不变形。第一天中午的午餐,算是“开工饭”。除去林非先生和我们定稿组里外地的三人,陪同的只有副社级以上领导两人,没有酒,好像点了六个菜——平均每人一个。经办其事的办事人员点好菜就客客气气告辞了,说自己还有事情,请各位慢用云云。其他编辑都在各自办公室吃“工作餐”。我们三个外地人,为了节约开支,只开了两间住房。我因为最老,单独住一间,另两位先生合住一间。

林非先生住得远,中午不能回家,社方就安排与我同住一间房午休。我是又高兴又担心。高兴不必说,担心的是我的毛病多,睡觉不安稳,害怕

影响林非先生休息。中午连吃饭一共两个小时,饭后也就是打个小盹儿,并不敢真的熟睡。我合上眼又睁开眼,看看对床的林非先生,他好像也翻来覆去睡不着,我们就索性起来,腿对着腿,坐在床沿聊天。房间很窄,真的是促膝而谈。他说自己虽然年纪大了,但很注意养生,身体还可以。养生有两个诀窍,一是尽量不在家中炒菜,油烟害人太厉害,尤其是在厨房操作的女同志。不想做饭,就出去转转,哪里合适、干净,坐下便吃,连碗筷都不用洗。如果必须做饭,宁可蒸菜也不要炒,微波炉倒是可以相信的。二是出门就搭的士,绝对不去挤公交车。因为,即使一分钱不花,豪宅,今生今世反正是买不起的喽,对不?挤公交车万一摔倒骨折,自己受罪事小,家人和朋友们跟着一起折腾,多么恐怖,知道在北京看病有多难吗?快到“上班”时间了,我冒昧地问了一句:学会,现在是什么情况?学会,即中国鲁迅研究会,林非先生曾担任该会会长多年,我也曾忝列为理事。林非先生愣了一会儿,双眼圆睁:学会?然后双手附耳,垂头长叹:死——了!

那时,我正和北京鲁迅博物馆馆长孙郁先生等联手编印《鲁迅研究年鉴》,从2002年出起。每出一本,我都寄给林非先生。年鉴出到2007年,“资金链”断裂,无奈停刊。后又勉强出版一期,到2010年,也终于无疾而终。如果林非先生问起《年鉴》来,我可怎么回答呢?

(本文作者为著名学者,青岛大学教授)

【性情文本】

吃啦

□火锅

刚结婚的时候,每当我妈煲电话粥,我家先生就说:“噫,又唱豫剧嘞?”

莘县在山东、河北、河南三省交界处,方言的腔调偏河南。莘县有一个乡镇,镇上有一个县政府,这个县隶属河南。高中同学有不少都是河南考过来的聪明孩子。

作为一个地理盲,我一直认为我是“鲁西南”人,大概“鲁西南”这个词听起来顺口,也常用“鲁西南革命老区……”后来才知道不是,我们是鲁西。

小时候我妈节俭,很少有机会出去吃。高中住校的同学把一中附近一家狗不理包子铺当理想国,回忆起来荡气回肠,我却毫无印象。而且我长大的那个时代,不是商品经济,本来也没有多少饭铺。等到我现在偶尔回老家一次,各种铺子都琳琅满目地出来了:吊炉大烧饼、蒸碗、胡辣汤、炸鸡蛋荷包、呱嗒……

吃起来就像是从小一直

吃的那样熟悉亲切,哪里的小吃都赶不上老家的蜂蜜大烧饼、蒸碗、胡辣汤。回老家一次,老同学不用问,摆上满满一桌蒸碗就好了,近几年胃口不行,闻闻味儿也能一解乡愁;老同学从家乡过来,就给带上一沓子蜂蜜大烧饼。这才相信,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按照《吃了吗》的作者魏新的话说就是:“一种特色小吃扎根在一个地方,一定和这里的水土有密切的联系。”

魏新和我同是生活在济南的县城人,他家在曹县,人家才是正宗的“鲁西南”。大概是都离河南比较近的缘故,他对吃的口味虽然偏重,我看着却觉得亲切。比如,他写的鱼汤是这样的:“县城的鱼汤,又叫小鱼汤,非常特别,甚至并不是用鱼炖出,而是混合着胡椒粉和各种大料的汤,加上炸豆腐、紫菜、香菜,最上面,撒上一层炸酥了的小鱼。里面若再荷包一个鸡蛋,倒上醋,就更完美了。”爱炖鱼汤的南方人看了,不知会作何感想,反正我看着就觉得很好吃,非常想去吃一吃。内陆长大的人对水里尤其是海里的食材没有什么执念,跟着大家吃海鲜,也觉得好吃,但吃过就算了,到底没什么情分,我可是一个永远不会主动去买螃蟹的人呢。看看《吃了吗》的目录页,有“羊的汤”、“辣的鸡”、“拉的面”,就缺“海的鲜”。

《吃了吗》让我觉得亲切的,还有县城风物。人有了点年纪,静下来的时候常常会想起小时候的事情,小时候身边的人。隔了几十年的时间去

想以前的事,很多事都变成了不同的事。比如:我们初中是个著名的纪律坏的学校,各种帮派,各种群架,每天打来打去。有一段时间忽然流行帮派里的大姐大或者小太妹吃安眠药,表演性地吃,吃了之后也不静悄悄地待着,而是在校园里东倒西歪地走,好姐妹在旁边看着快要倒了,就扶一扶。我还记得一个女孩子被摺倒在地灌肠,她嗷嗷地叫着,水通过喉头的时候她就咕咚咕咚地叫,带着哨音地叫。这样的“自杀”常常是用来表达对男朋友的坚贞。至于为什么安眠药竟然有这样浪漫的用途,那真是无语问苍天。

像这样的县城故事,很少被讲述。出现在各种叙事中的中国,好像就分为两部分:京沪广和广大的乡野,县城这样落在缝里的地方是飞地。当初看到贾樟柯的《小武》和《站台》特别激动,因为拍出了县城生活的那种特殊的质感。魏新以前写过一部长篇我很喜欢,叫《动物学》,大部分都是在写县城生活,那种嘲谑和荒唐的风味,倒有一点“县城里的王朔”的意思。《吃了吗》当然不光是写吃,还写那些和吃喝有关的事:卖红烧羊羔的亲兄弟大头生和二头生默默地打起来了;校园里流行一个同学买雪糕,其他同学就纷纷去咬,“三五口就把一个雪糕从美国咬成日本”;酒晕子喝醉了,随便往马路上一躺;酒后的男人动不动就拜把子,要不就掀桌子。这些都是烙着县城的印章的故事。

说起酒来,这本书里有一

篇《老老酒晕子》,写得张狂任性,颇有众人皆醒我独醉的傲娇,和一些写醉酒的唐诗宋词一样,称得上是最好的酒文字。写到这里我又有些明白我觉得这本书亲切的原因,那就是对于县城,魏新提供的是和我的记忆互补的男性视角。我是严厉家庭长大的那种“好女孩”,我所能想起的县城,几乎就等于充满清规戒律的“一中”。按照魏新文中的自陈,我想小时候他应该是那种说坏不坏、半混江湖半不混的聪明男孩。跟着他的笔,我又把那些县城里没有去过的地方,没有打过交道的人认识了一遍。我和他不是熟朋友,他的一个熟朋友有一次转述他的话——他颇有点得意地说起自己在县城的读书时代:“(尽管在江湖上混)……我从来没有挨过揍。”这句话实在太形象,意蕴丰富,带着它去读这本书,会更更有滋味。

而且,这本书里,还有袁朝霞简洁有致的印、黎洵一派天然的画,于恺像冬日枝杈一样的字。感觉集合了这些人,《吃了吗》就可以召唤神龙了呢。

看这本书,脑子里常常默默地回旋着一个对话,也不知道说者和答者是谁,从哪里来,又要到哪里去:

吃了吗?

月饼,羊汤,拉面,烤串,饺子,粽子,白菜,龙虾,辣子鸡……

……

吃啦。

(本文作者为山东艺术学院副教授,电影学硕士生导师)

